

## 《中国近代史》第十一章第四节

作者：张海鹏 发布时间：2004-6-22 12:45:17

### 第四节 国共合作破裂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

随着国民革命的深入进行，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在组织上和影响上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在国民党上层内部，国共合作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国民党改组过程中，以邓泽如为代表的一批老资格的国民党人，就直接上书孙中山对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作用表示怀疑与反对；国民党“一大”期间，一些代表又公开反对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所有这些经孙中山详加解释与劝说，矛盾才平息于一时。而“一大”会后不过数月时间，因共产党员“跨党”以及两党公开宣传意见不一而引起的冲突更多，并且导致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孙中山不得不交付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讨论，最后经鲍罗廷出面调解，决定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内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要求共产党必须将其与国民党有关的活动全部通报于该委员会，此事才算告一段落。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孙中山逝世后，部分国民党中央监委在容共问题与汪精卫等意见冲突，导致分裂，前者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公然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通过《取消共产派在本党党籍宣言》和《取消共产派在本党之党籍案》，并宣布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中之共产党员，形成了所谓“西山会议派”，树立了一面公开反对国共合作的旗帜，对两党合作造成了更加不利的影响。

“西山会议派”出现后，国共合作的形式问题变得格外敏感。为避免更多地刺激尚属中间派的国民党人，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劝说中共中央领导人陈独秀等一同做国民党中间派的工作，声明共产党人在国民党领导层内决心做少数派，保证将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共产党人数限制到最低限度。因此，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尽管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翼代表占了全体代表一半以上，会议从议程到决议内容几乎都在共产党人的影响之下，但在60名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当中，中共党员只占15人，仅为四分之一。在20名中央监察委员和候补委员当中，中共党员只占4名，还不足五分之一。

不过，国民党“二大”会后，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央及各部中的地位实际上不仅没有减弱，而且明显地开始处于掌权的地位。除9名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有谭平山、林祖涵、杨匏安三人外，在中央党部所设一处八部共21个职务当中，共产党员竟占到17个，其中秘书处3人为谭平山、林祖涵、杨匏安，书记为刘芬；组织部长谭平山，秘书杨匏安；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秘书沈雁冰；农民部长林祖涵，秘书彭湃、罗绮园；妇女部秘书邓颖超；青年部秘书黄日葵；工人部秘书冯菊坡。

不仅如此，共产党这时在广东还掌握了大约10万工人，60万农民，2000名工人纠察队，3万农民自卫军。在国民革命军中，中共党员达百人以上，其第一、二、三、四、六军的政治部主任，第一军中三个党代表中的两个，9个团中7个团的党代表，以及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秘书、主任政治教官和政治教官，均为共产党员。再加上这时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中作用突出，苏联顾问分任军事各部门主管，国民党的所有计划、章程、工作都是在顾问团的指导下制定的，因此，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影响之大，仍旧举足轻重。

但是，就在共产党人极力争取中间派不向右倾的时候，一向被视为左派国民党人的蒋介石突然发动了反苏反共的“三二〇事变”。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原本资历较浅，国民党“一大”时甚至都不曾入选中央。只因孙中山对其军事素养颇为看重，才赋予其黄埔军校校长的重任。而蒋介石则因此成为国民党党军的创始人，至平定商团叛乱，蒋介石跃升为当时最高指挥机关革命委员会委员，兼军事行动总指挥。但直至孙中山逝世，国民政府成立，仍不过只是国民政府8位军事委员之一，连国民政府委员都不是，国民政府最主要的军事领导人，即政府军事部长还是前粤军将领许崇智。蒋介石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他在联苏以及联共问题上的鲜明态度，从而赢得了鲍罗廷和苏联军事顾问对他的好感。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被刺身亡，胡汉民似有牵连，于是鲍罗廷力主，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成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警察全权”，并任命蒋介石为广州卫戍司令。随后，鲍罗廷又支持蒋以许崇智部下图谋不轨之名逼走了许崇智，扶助他到仅次于汪精卫的重要地位。到国民党“二大”时，蒋介石自然而然地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并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

国民党“二大”以后，鲍罗廷回国述职，留在广州负责的苏联军事顾问组组长季山嘉在处理与蒋的关系上，轻率傲慢，完全不顾及蒋介石生性多疑、个性极强的特点，致使蒋怀疑苏联顾问“倾信不专”，另有所爱，企图对他不利。当蒋意外得知代理海军局局长的中共党员李之龙将中山舰调往黄埔，当即怀疑这是季山嘉背后指使“共产党陷害”，打算将他强行送往苏联。于是，3月20日凌晨，蒋介石指挥自己的军队实行戒严，不仅逮捕了李之龙，而且包围了苏联顾问的寓所，收缴了工人纠察队和苏联顾问卫队的武器，扣押了第一军中所有的共产党员。随后，汪精卫负气出走，鲍罗廷赶回调和妥协，蒋介石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召集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整理党务案》等限制共产党人活动和苏联顾问权力的具体办法，禁止共产党员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职务，禁止苏联顾问担任政务官。蒋介石的这一作法，使国民党的联苏联共政策，开始明显倒退。

北伐开始前，蒋介石在国民党已经是大权在握了。除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交给他的密友张静江，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交给了谭延闿以外，其他像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党部常务委员会主席、中央组织部长、军人部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军党政要职，蒋介石都一肩挑了。这也难怪无论是鲍罗廷，还是中共中央，都开始担心蒋介石会搞军事独裁，从北伐战争一开始，就一直在设法“迎汪复职”，实际上是想“迎汪抑蒋”。但越是如此，蒋介石也就越是对鲍罗廷和共产党抱以强烈的戒心，乃至敌意。1927年1月，围绕着国民

政府究竟是应当由广州迁南昌，还是迁武汉的问题，鲍罗廷明知蒋介石的“虚蒙心强得吓人”，在武汉还是当面尖锐批评了必欲把政府设到南昌自己的地盘上去的蒋介石。结果，蒋介石一离开武汉，马上就要求撤销鲍罗廷的顾问职务，双方的矛盾冲突更加白热化了。

面对蒋介石公然反对中央的行为，从1927年2月起，在武汉的国民党人开始掀起反对独裁，恢复党权的运动，矛头直指蒋介石。为切实恢复党权，3月中旬，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会议通过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等决议，明确规定：党不设主席，“全国代表大会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大会闭会后，“党的权力机关为中央执行委员会”，而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对于党务、政治、军事行使最终决权”，从而剥夺了蒋介石的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张静江的中执委代理主席的职务，并将蒋介石的中央组织部长一职改由汪精卫担任；会议并且决定，军事委员会不设主席，而设主席团，主席团的决议和命令，须有主席团委员四人签名方生效力，而总司令、前敌总指挥、军长等要职，均须由军委提名，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任命，原属中执委的中央军人部撤销，军事院校改校长制为委员制，从而取消了蒋介石原先担任的军事委员会主席、军人部部长、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等职。所有这些，无疑都是要限制蒋介石的个人权力，防止其搞个人独裁和军事专政。但是，会议仍选举蒋介石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9名常务委员之一，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团7名委员之一。并且，蒋仍旧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占领南京时，发生了直鲁联军败兵乘乱抢劫外国人钱财的情况，英、美、日等国停泊在南京下关的军舰，受命炮轰南京，造成严重伤亡，史称南京事件。此事发生后，蒋介石等人竟坚持认为是共产党人故意造成外交纠纷。蒋介石于26日到达上海后，自然更加仇视共产党。再加上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后，各地均出现反蒋与拥蒋的公开冲突，因此，到3月底4月初，在蒋介石军队占领区内，如杭州、福州、赣州等地，已接连发生反共事件，陆续有共产党员被捕被杀。

4月2日，在上海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古应芬、李宗仁、黄绍竑、陈果夫、李石曾等8人举行中央监察委员全体会议，断言武汉中央执行委员已为共产党和鲍罗廷所把持，决定采取非常紧急处置“将各地共党首要的危险分子，就地照治安机关，分别看管，制止活动”。恰好，汪精卫刚从欧洲回国，来到上海。蒋介石为争取汪精卫，除亲往码头迎接外，还率吴稚晖、李石曾、李宗仁、白崇禧、柏文蔚、古应芬等到汪精卫下榻的孔祥熙公馆，劝说汪精卫赞同赶走鲍罗廷和与共产党分手。汪精卫当年负气出走，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蒋介石以军欺党欺政，他如何会愿意在上海听任蒋介石支使。因此，尽管蒋介石3日特意发表了“拥汪”通电，汪精卫仍旧一心打算回到国民党中央复职。对蒋介石等人的劝说，他只好不置可否，强调“政策关系重大，不可轻变，如果要变，应该开中央全体会议来解决”。而转过来，他就找到陈独秀，转述蒋介石等人的说法，与陈独秀共同起草了《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明确表态：所谓“共产党组织工人政府，将冲入租界，贻害北伐军，将打倒国民党”，或所谓“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种种，纯属“造谣中伤”。在4月5日联合宣言发表的当天晚上，汪就悄悄登船离开上海，前往武汉了。

汪精卫刚刚离开上海，盘踞北京政权的北方奉系军阀就在列强的支持下，包围并搜查了苏联驻华大使馆及其附属机构，逮捕了在使馆避难的大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李大钊等因此被杀。而在南方的蒋介石等人也终于忍耐不住，迫不及待地开始分共清党了。

4月12日凌晨，与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总工会对立，得到蒋介石军队支持的“中华共进会”、“工界联合会”人员，臂缠“工”字袖套，有预谋地向上海总工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进行攻击，双方发生严重冲突。这时，刚刚接防的周凤歧的二十六军立即以制止工人内讧为名，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械，并占领了上海总工会的驻地。当天上午，总工会领导的各会得知消息，群起上街抗议，并重占了总工会。总工会并发布命令，决定13日上午开始罢工，要求惩办祸首，发还武器，抚恤死难工人家属。不料，当示威群众游行至宝山路二十六军司令部时，遭到军队的开枪射击，工人群众死伤达300余人。13日，上海总工会致电蒋介石，质问“何以今日竟发生此类类似军阀之行动？”上海各业工人20万人参加了同盟总罢工。游行群众要求二十六军释放被拘工人，交还纠察队枪械，遭二十六军开枪屠杀，立毙百余人，伤者不计其数。截至15日，共产党员、工人领袖和革命群众被杀者300人，被捕者500人，逃往失踪者5000余人。包括上海临时市政府和上海学生联合会、各界妇女联合会，以及上海总工会下属各级工会等，均被封闭。以亲苏亲共起家的蒋介石，公然背叛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解散在大革命高潮中建立起来的上海工人纠察队，镇压工人游行，屠杀共产党人和工人领袖，显然是背叛孙中山和国民党一大革命精神的行为，是反抗国民党中央的行为。历史上把蒋介石这一天在上海对共产党和上海总工会的镇压称作“四一二政变”。

继“四一二”事变后，4月15日李济深在广州也以同样残酷的手段开始清共。广州军警在全城进行大搜捕，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中山大学以及革命的工会、农会、妇女组织全被捣毁，黄埔军官学校也被解除武装。逮捕屠杀延续一周之久。总计被捕共产党员及革命分子2100余人。萧楚女等著名共产党人亦被害。与此同时，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广西和四川等省区，也都先后发生了同样的情况。不仅如此，蒋介石等在南京另行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并决议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告成立，胡汉民被推为政府主席，钮永建为秘书长，胡汉民、伍朝枢、古应芬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蒋介石、胡汉民、张静江、柏文蔚、吴稚晖、邓泽如、李石曾、蔡元培、李宗仁、何应钦、古应芬、柏文蔚、陈铭枢等为委员。当天，南京国民政府还发布了“秘字第一号令”，要求各地将鲍罗廷、陈独秀、徐谦、邓演达、吴玉章、林祖涵、恽代英、毛泽东、董必武、夏曦、邓颖超、罗亦农、高语罕、邓中夏、许白昊、林育南、李汉俊、罗章龙、李立三、刘少奇、王若飞、周恩来、彭湃、刘伯承、彭述之、蔡和森、张国焘、柳亚子、章伯钧等197人缉拿归案重办。

1927年5月5日，南京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及各部长联席会议决定组织中央清党委员会，并制定了“清党原则”。胡汉民在宣讲“清党之意义”时赤裸裸地表示：“我们这次清党，是进一步把共产党的死灰都要送还给俄罗斯，不能让他遗留在中国的。干脆地说，这次的清党，就是要消灭中国共产党。”随着清党委员会成立，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势力范围内，各省的政府和党务部门纷纷改组或重建，由南京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重新任命了各省市政府、政治分会、省市党部的组成人员，逐级建立起南京国民政府的基层政权和南京国民党中央的基层组织。于是，南京国民政府通过种种措施，很快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贵州和四川等省，不仅造成了宁汉对立的局面，而且在事实上也对武汉国民政府形成了巨大的威胁。

“四一二”政变后，武汉国民党中央迅速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下令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但是，如何应付这一严重局面，在武汉政府内部，以及在共产国际代表、苏联顾问和中共中央内部，都存在着尖锐的意见分歧。一部分人主张东征上海、南京，首先讨伐蒋介石，一部分人主张先北伐，说武汉、南京和北京三方面，武汉实力最弱，需要北伐迎接冯玉祥国民军出陕，打败奉系军阀，再回过头来收拾蒋介石；而另一部分人则强调武汉政府占据的两湖地区基础不

牢固，应该先在两湖地区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取得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后再北伐或东征；甚至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最牢靠的根据地还是广东，因此应当实行南征，回过头去讨伐李济深，重建广东根据地，再来北伐。几种意见争来争去，直到武汉国民政府最终决定继续北伐，争论才算告一段落。

4月19日，武汉政府在武昌举行了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21日，以唐生智为总指挥的三个纵队的北伐军开始沿京汉铁路向河南开封进军。而冯玉祥也于5月1日在西安宣誓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分兵五路，于5日出潼关向东进发。随后，阎锡山也宣布服从三民主义，被武汉政府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向娘子关出兵。到6月1日，武汉北伐军与冯玉祥部会师郑州。接着，北伐军很快就占领了开封。奉军被迫撤出河南。武汉政府第二次北伐的第一期作战计划顺利完成。而南京政府差不多同时也分三路进行北伐，击败了直鲁联军和孙传芳残部，于6月2日占领了徐州。宁汉两支军事力量这时都推进到了陇海线上。

就在武汉政府继续北伐的过程中，武汉政府开始陷入严重危机之中。

首先是经济危机。作为华中地区商业中心的武汉靠的是交通发达，宁汉对立后，两湖地区四面被围，京汉路、粤汉路以及长江上下游的交通全面断绝，生产停滞，商店倒闭，市场严重混乱，迅速出现米荒、煤荒，造成民心浮动，社会生活陷于瘫痪状态。

其次是政治危机。武汉政府最初的政治基础，是强大的工农运动的支持。但是，工农运动无论同工商业者，还是同农村中的富裕阶层，都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尖锐矛盾。再加上大革命初起，共产党既缺经验，又缺干部，不能有效地引导和控制工农运动，因此工农运动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过火的现象，这些都不可避免地使国共两党之间引起了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

5月21日，极端仇视工农运动，驻防长沙的唐生智主力部队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率部包围了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和长沙市党部，以及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省党校、省工运训练班、省农民运动讲习所、省特别法庭等重要机关和团体所在地，解除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的武装，枪杀了上百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按照旧日的电报代码，21日为马日，所以许克祥在长沙的行动史称“马日事变”。

马日事变一旦发生，湘潭、衡阳、武冈、益阳、湘阴、桃源、永州、浏阳、临湘、安乡、辰州、叙浦等地的驻军和土豪，都纷纷开始向当地的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进行反攻倒算。5月27日，许克祥等甚至还在长沙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湖南救党委员会”，通令各级党部及民众团体一律改组。武汉国民政府迅速开始失去对湖南大部分地区的管辖权。

面对越来越危急的局面，汪精卫等国民党领导人自然不会去谴责许克祥造反，他们反而是劝慰许克祥说：“湘省工农运动幼稚失当，中央早思制裁”，“故对于此次军队与工农纠察队冲突，亦能谅解”。并且接二连三地发出命令，制止工农运动“过火”。眼见军队的反动越来越严重，鲍罗廷和陈独秀等也是忧心忡忡，相信此事只能和平调解。想不到鲍罗廷与国共两党代表组成赴湘委员会，刚走到岳阳，就被许克祥一封“就地拿获处决”的密电唬了回来。

这边马日事变尚未解决，那边江西的朱培德也开始了将共产党员“礼送出境”的行动。5月29日，朱培德召集第三军全体政治工作人员谈话，强迫第三军中142名政工人员离开军队，并派一团士兵将他们押送出境。6月初，朱培德进一步送走了最后一批共产党人，便下令查封了江西省总工会和农民协会等群众团体，并出动军队收缴了农民自卫队的武装。理由也是：“制止过火的工农运动！”

如何对待这时的工农运动，成了武汉地区国共两党分歧的关键。5月底，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两次发来紧急指示，强调要想解决眼前的危机，第一必须从自下而上地夺取和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彻底的土改；第二必须从土地革命中提拔新的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里去，改组国民党中央党部，以取代那些害怕事变的老头子；第三必须立即开始建立由革命工农组成的，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八个师或十个师，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用军官学校的学生来充当指挥员；第四必须组织有声望的、不是共产党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残害人民、残害工农的军官。

对于共产国际的五月紧急指示，无论是鲍罗廷，还是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都明确认为没有实现的可能。但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却把希望寄托到了汪精卫的身上，他未经任何人同意，便去劝说汪精卫接受莫斯科的建议，并且把指示的复本交给了汪精卫。

6月下旬，冯玉祥也开始了分共的行动。他宣布，所有共产党员或者宣布脱离共产党并宣誓效忠国民党，或者一律脱离军队。在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察之后，冯玉祥把他军队中的200余名共产党员和在他管辖区域内发现的40余名共产党地方干部统统集中到郑州，每人送上一笔钱，然后用一个闷罐子车皮把他们一下子都拉到武胜关，算是礼送出境。

与此同时，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于6月28日也在汉口公开发表了反共宣言，要求武汉国民政府和唐生智“明令与共产党分离”。而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李品仙，也开始密令军警人员查封共产党的机关和总工会，看管苏联顾问，准备遣送出境。

事已至此，无论是汪精卫，还是共产党，都再也不可能存继续合作的幻想了。共产国际一面严厉批评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右倾妥协，一面明令共产党要发表宣言，以强硬姿态退出反对土地革命的国民政府。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也于7月14日秘密开会，决定分共。在次日举行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汪精卫宣读了他从罗易手里得到的共产国际五月指示，并表示：随便实行这个指示中的那一条，国民党就完了！他断言，既然共产党退出国民政府，便无异脱离本党；“既然退出国民政府，则在国民革命军中、各级政府机关中，亦无须存在。”

7月16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公布了15日的决议，并向国民党各级党部发出了“分共”的训令。随着共产党人8月1日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之后，汪精卫集团的和平分共便进一步发展到武力清党了。武汉政府8月2日即发布布告，宣布凡是继续从事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一经拿获，即行明正典刑，决不宽恕”。8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也下达了通缉共产党人的名单。

从此，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由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就这样失败了

[下一节](#) [上一节](#) [返回目录](#)

转载务经授权并请刊出本网站名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您是第位访客